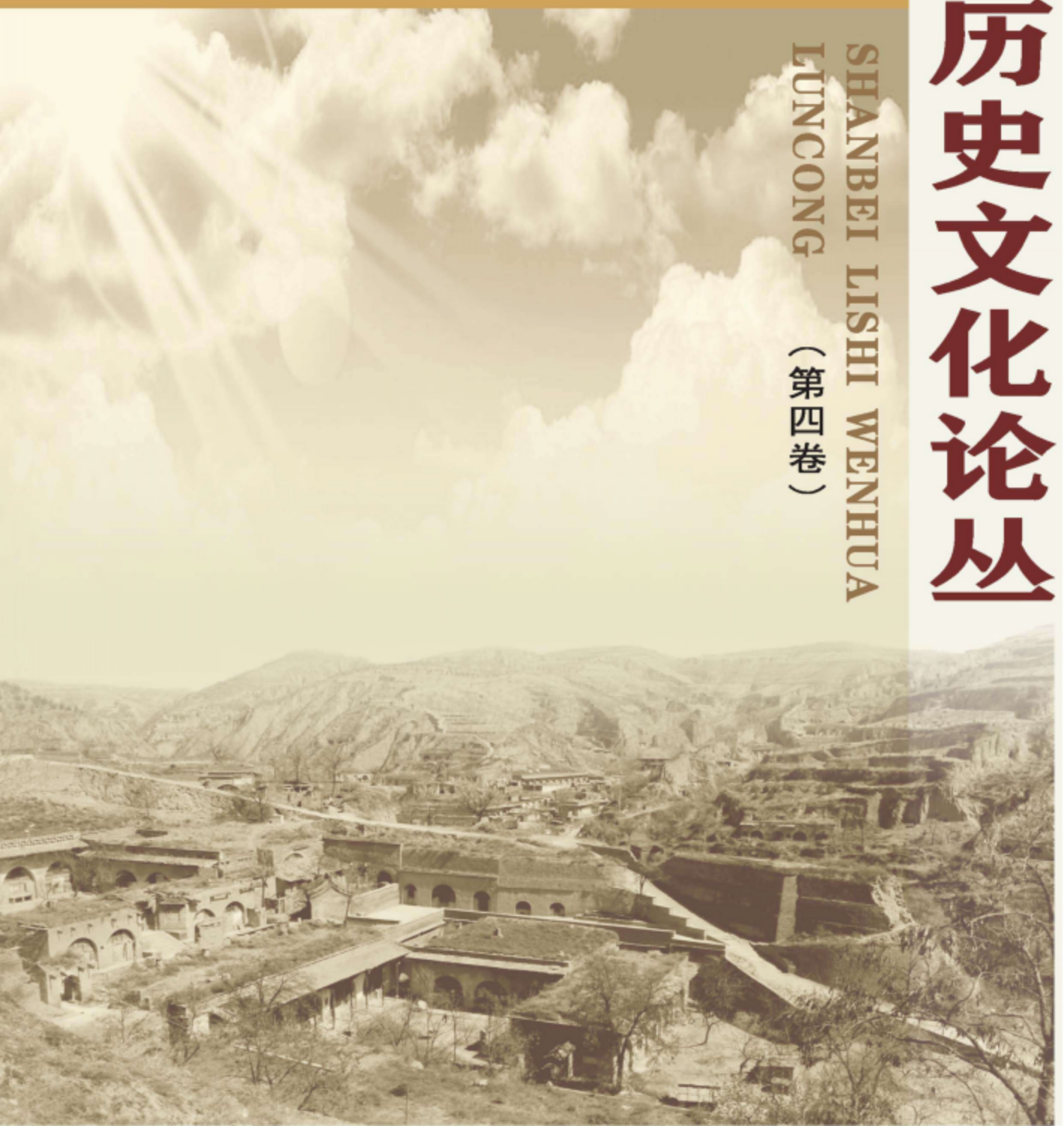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

主 编 / 张小兵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SHANBEI LISHI WENHUA
LUNCONG
(第四卷)



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

(第四卷)

主 编 张小兵

副主编：侯虎虎 王保存

上官红伟 高建国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第四卷/张小兵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224 - 11894 - 0

I. ①陕…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陕北地区—文集
IV. ①K294.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4461 号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 (第四卷)

主 编 张小兵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0.75 印张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894 - 0
定 价 48.00 元

序 言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第四卷)编辑完成即将付梓,我不得不写一个序来使关心陕北文化的同仁重视此书,亦希望此书成为大家所喜欢的书籍。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前三卷主要收录延安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及教师的有关陕北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这是对延安大学多年来对陕北文化研究的总结和盘点。这使我们清楚了延安大学有多少人热爱陕北、关注陕北和研究陕北,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耕耘的领域和成果,真的很有意义。有人说出论文集就是炒剩饭,学校的科研统计把论文集发表的文章不算成果,论文集也不算研究著作,但是文化学者最希望在研究某个问题或涉猎某个领域时,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文集,百家一题,交锋热烈。我们就是从研究者这一需求出发,编辑这个论丛的,无论别人怎样贬低这一工作,我们都不放弃。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第四卷,与前不同。首先,我们改变了选稿的方向。过去我们仅选延安大学师生的论文,原则是本土人研究当地文化,一定不会跑偏,一定成果累累。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受地域的限制,地方学者还是无法把握宏观的问题。第四卷我们一改往日的原则,眼界放宽,从中国乃至世界上选择研究陕北的名家,选择关于陕北文化的宏论,这是本辑的主要特点,亦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其次,本卷的体例也做了大的调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陕北历史民族研究(由高建国博士编辑),第二部分为陕北军事与战争研究(由上官红伟博士编辑),第三部分为陕北社会变迁研究(由王保存副教授编辑),第四部分为陕北历史文献研究(由侯虎虎副教授编辑)。陕北的历史就是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北方民族和汉族的融合,成为陕北文化的主要特征,各族多彩的多元文化,来者不拒有超强融合特征以及由汉族中原过渡到少数民族边疆文化的过渡色

彩，成为陕北文化的一大特征。为什么要把战争军事做一个板块呢？陕北区域的特殊性，使这一区域成为捍卫中央王朝的边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的交融地，亦是异族战争的拉锯争夺地，所以一部陕北历史，半部就是军事史、战争史。加上陕北人好义尚勇，经常揭竿起义，陕北的编年史是以血与火写入中国史册的。陕北社会变迁的研究，成为解析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革命成功、中国制度更迭的一把钥匙。陕北的社会变迁在近代很具代表性，用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手段剖析陕北社会，是陕北文化研究的方向和前途，我们选择了几位知名学者的文章，想必对同仁有所启发。陕北历史文献研究，与其他地域史文化史文献研究一样处于薄弱环节，我们现行的评价机制把这类成果不作为个人著述，更可笑的是有人竟将注疏校注者认为是第二作者，甚至比译著者地位还低，我们的评价体系使我们几乎扼杀了文献整理工作。陕北历史文献就是在这个逆境中起步的，举步维艰、小有进步，编辑这一板块，希望引起学界重视史料的研究。

第三，本辑注重收集陕北历史文化中宏观问题的论述，注重把陕北史放在中国史中来考究陕北史的地位和价值，注重把陕北文明放之于世界文明的长河中来评述其作用与价值。比如从中国西北民族研究来解读陕北民族的变迁，从宋代的边防战略来看陕北的宋代战争，从明九边看陕北的军事地位，居高临下，由大及小，对陕北历史文化有了更准确的定位和认识。

《陕北历史文化论丛》的出版就是希望从事陕北历史研究的同仁，站在前人搭建的台阶上，拾级而上，站上更高的一个平台，从而走出地域的幽谷，拨开认识的雾障，看到一条更宽广的道路。为陕北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为陕北历史文化的繁荣，我们将把《陕北历史文化论丛》编辑工作一直进行下去。

张小兵

2016年12月17日

目 录

陕北历史民族研究

-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 周伟洲 (3)
- 《春秋》与《左传》中所见的狄 杨建华 (38)
- 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 唐晓峰 (47)
- 府州折氏族源、改姓的新证据 高建国 (53)
- 略论党项拓跋部在陕北的割据 王天顺 (62)

陕北军事与战争研究

- 论宋、夏在陕北的争夺 吕卓民 (73)
- 太平兴国四年以前的北宋边防措置 闫建飞 (82)
- 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 程 龙 (100)
- 论宋夏战争 李华瑞 (123)
- 西夏与顺宁寨 [日] 前田正名著 吕卓民译 周伟洲校 (132)
- 明代延绥镇国防措施的演变与成因分析 孙卫春 (139)
- 龙翔凤翥——榆林地区明长城军事堡寨研究 张玉坤 李 哲 (148)
- 论明代九边延绥镇之形成 胡 凡 (156)
- 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 李大海 (170)

陕北社会变迁研究

- 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与地方宗族 秦 燕 (187)
- “封建堡垒”中的革命: 陕西米脂杨家沟 周锡瑞 (197)
-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 岳谦厚 郝东升 (213)
- 我所亲历的陕北农村生活 黄敏兰 (228)
- 陕北骊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 郭于华 (239)

陕北历史文献研究

- 万历《延绥镇志》纂修考述 王应宪 (271)
- 论陕北方志存录诗歌的文献价值 刘向斌 (277)
- 记录榆林岁时民俗的几种地方文献 韩一敏 陈公维 (287)
- 绥德县博物馆藏印选释 王翰章 李 林 (291)
- 唐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杨敏墓志考 段双印 刘合心 (298)
- 杨敏墓志考补 周 铮 (303)
- 子长县新发现的元代佛教史料 李福顺 (306)
- 白云山碑刻与壁画的文化价值 吴敏霞 (311)
- 黄陵县发现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告成碑 魏迎春 郑炳林 (318)

陕北历史民族研究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 与民族融合

周伟洲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诞生了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以华夏族为主的周边各个古代民族也逐渐形成。^①此后，历经各朝各代，中国始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态连续下来，绵延至今。在这约四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境内各民族有矛盾和战争，有和平友好的经济、文化交往，但“各民族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造就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②。其间，有的古代民族消失，融入了其他民族；又有新的古代民族形成了；也有的民族融合了其他民族而日益壮大。这种历史现象，学界统称为“民族融合”，或“民族溶合”“民族整合”，它包括“民族同化”（又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③即是说，在近代中国形成之前，古代中国像一个民族大熔炉，各个民族在这一大熔炉中，不断发展、变化、整合，最终形成近现代的包含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正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所说“它（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

在历史上中国这一民族大熔炉中，陕北地区的民族及民族融合无疑具有典型的意义。陕北地区在今陕西省的北部，地处黄土高原的中部，东临黄河中游与山西省相邻，

^① 关于“古代民族”及华夏族形成的时间，国内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此据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与汉族》一文观点，文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 见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载《光明日报》1981年6月22日。

^③ 对“民族融合”的理解和认识，参见周伟洲《中国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重版本，第10—12页。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西抵六盘山,北沿长城与内蒙古河套相衔接,南至渭水以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800至1200米。境内泾河、洛河、延河、无定河等切割高原,地形破碎,沟壑纵横,为农牧业过渡地带。由于陕北北边为古长城外接河套内蒙古草原,自古以来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错之地,历史上北方各族与农耕的华夏族(汉族)先后交错居于此,民族与民族融合十分复杂,且具有鲜明的特征,可以说是历史上中国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因此,疏理和研究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融合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今天处理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特别是边疆民族关系,又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

一、先秦时期陕北各族及其融入华夏

早在远古时代,陕北就有了人类居住。1978—1980年,科学工作者在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萨拉乌苏河一带,继续过去外国学者发现的“河套人”及其文化遗址的考察工作,获得人类化石19件和石器多件。其中有部分属细石器,制作精致,大部分有二次加工的痕迹。根据化石层位及出土石器,“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河文化距今约5万—3.7万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①此时,人类祖先已由直立猿人逐渐发展为“智人”,随之氏族产生。

陕北地区目前发掘的截至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更多,如属于陕西仰韶文化晚期的横山脑海圪堵遗址等^②;属陕西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的绥德小官道遗址,神木县寨峁、刘石桥畔、孙家岔、大柳塔遗址,府谷县郑则却新村,榆林市的刘家庙、刘兴庄,横山县的水磨沟等^③;还有近年来发掘的神木县木柱梁遗址^④、石峁遗址等。特别是2011—2012年陕西考古工作者调查和发掘的神木县石峁遗址,为一大型的“石城”,分为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外城有弧形的石墙。整个城址总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址。出土文物有玉器、彩绘几何纹壁画、陶器、石器、骨器等。这应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大型中心聚落。考古工作者“初步认定此石峁城址修建于龙山中期,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早期毁弃”^⑤,距今4300年左右。对这一震惊学界的中国史前遗址的发现,有人用“石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新收获》,载《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③ 吕智荣《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及晋北地区寨峁文化》,载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新收获》,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

^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新收获》,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

天惊”来形容，有人推测此城址为轩辕黄帝居所或都城，还有人说是匈奴族的起源地，等等。关于此城址的研究还在继续之中，但至少能说明，陕北地区早在4000多年前已跨入中国文明的门槛。



图一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

(摘自《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封底图一)

公元前21世纪，在黄河中下游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夏朝，古代民族华夏族也开始形成。华夏族势力是否北抵今陕北地区，目前还没有文献及考古资料来证实。然而，到公元前16世纪商人灭夏国，建立商朝（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商承夏，商人成为华夏族的代表，其势力则达到了今陕北地区。据文献记载，今陕西北部及河套一带，有一种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夏代统称为“荤粥”，商代称“鬼方”（鬼戎）。《易经·既济、未济》记“商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①周季历时（商武乙三十五年），“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狄）王”^②。商两次伐鬼方，各历时三年，可见其势力之大。周文王时，史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③，玁狁即鬼方。在殷武丁时的甲骨文卜辞中，还见有“鬼方易（飏）”的记载，可能是鬼方在商的打击下，有一部分向北方的漠北迁徙。^④

①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2—73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71页。

③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小雅·采薇》，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63页。

④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3页。



图二 陕西绥德塬头村出土的兽首匕、蛇首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今陕北绥德、清涧及晋西北的石楼、永和、保德等地发现一批殷商时的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内有典型的殷式青铜礼器,如簋、壶、觚、鼎、爵等;也有北方式的青铜武器,如蛇首匕、兽首或环首背弯刀等。^①后者与蒙古、俄罗斯

贝加尔湖一带青铜文化中的卡拉苏克文化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

据国内学者的研究,陕北、晋西北出土的殷代青铜墓葬,可能是殷时鬼方的遗址,代表我国北方青铜时代文化,向北与卡拉苏克文化有关系,同时亦强烈地影响到殷商文化。^②这是陕北等地游牧民族鬼方文化与作为华夏族的商文化最初的碰撞、交融的实物例证。

到公元前11世纪,原为商朝方国的周人兴起于今陕西关中的西部,并逐渐接受华夏文化,至周武王伐灭商朝,建立周朝(西周),定都丰、镐(今陕西西安西)后,周人渐融入华夏族。西周时,其王畿所在的关中北部和西北部,据文献记载,有獫狁和犬戎为主的诸戎。獫狁,有的学者认为即混夷、犬戎,然文献与甲骨文对二者的记述是有区别的,应为两族。獫狁即商时的鬼方,媿姓之族,属后来北方“狄”的系统;犬戎属西戎的系统。两者的居地大致相同,獫狁稍偏东北,故论者多以此两族为一族。文献及金文中多有獫狁侵周及周人伐獫狁的记载。如《诗经·采芣》说“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启居,獫狁之故”;周书《六月》亦记“獫狁孔炽,我是用急”,“薄伐獫狁,以奏肤公……獫狁匪茹,整居焦获(今陕西泾水北),侵镐及方,至于泾阳”。^③出土的《虢季子白盘铭》载“薄伐獫狁于洛之阳(今陕西洛水北),折首五百,执讯五十。”^④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早期金文中仍保留了商代“鬼方”的名称。如《小孟鼎》(周成王时器)铭“王□孟□□□伐□方(鬼方),□□□□□[执兽]三人,隻(获)臧四千八百□二臧,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十辆,孚牛三百五十五、羊廿八。”^⑤鬼方到西周中期,则称为獫狁,春秋时称之为“狄”。可见,西周时陕北等地的獫狁族的势力很大,其地在渭水以北及陕北等地,与

① 黑光、朱捷元《陕西绥德塬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载《文物》,1975年第2期。

② 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③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413、424页。

④ 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⑤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5—76页。

华夏族的周人时有征战。

西周幽王十一年（前 771），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春秋（前 770—前 475）、战国（前 475—前 221）时期。自周平王东迁后，秦人兴起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并逐渐吸收华夏族文化。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秦人势力渐强，逐渐东进，先后迁都，最后定都于咸阳。在这一过程中，秦人不断兼并附近的诸戎（即以犬戎为首的西戎）的同时，与其北边渭北及今陕北的狄族相接。此时之狄族，与殷周时的鬼方、豳狁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春秋战国时的名称。据《春秋》三传、《史记》、《国语》等先秦、秦汉史籍载，春秋时的狄大致可分为白狄、赤狄和众狄（包括后之“长狄”）几个大的部落集团。赤狄主要分布在晋国（今山西及河北南部）；白狄则居于秦国北，今陕西渭、洛流域及陕北、山西西部；其余众狄均在今山西、河北、河南等地。^①

白狄，姁姓、姬姓，《国语·齐语》记齐桓公曾“西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河，在今晋西北或陕北一带，与后汉西河郡名有关。《左传》成公十三年（前 578）所载晋国吕相《绝秦书》中亦说“白狄及君（秦桓公）同州（雍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②又晋公子重耳（晋文公）因国内乱，被迫逃至狄，与狄君“田（狩猎）渭（渭水）滨”等。^③这些事实均说明白狄主要居地就在今陕西渭水以北、陕北等地。

赤狄与白狄与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晋国采取“启土安疆”的方针，即用武力或用财物賤买土地等方式，迫使狄族迁徙或臣属，以扩大自己的领土和势力。因此，晋国对邻近的白狄也时常“讨伐”，引起白狄与赤狄的联合反抗。如晋献公二十五年（前 652）晋里克曾伐白狄于采桑（今山西临汾北）^④；晋文公九年（前 628），白狄又南下伐晋，兵入箕（今山西太谷）等^⑤。此后，赤狄各部渐为晋所灭，白狄势孤力单，成为邻近相互争霸的两个大国——秦、晋争相结盟和争夺的对象。晋成公（前 606—前 600 年在位）竭力拉拢白狄以抗秦，六年（前 601），支持白狄与之共“伐秦”。^⑥秦也积极拉拢白狄，支持其“伐晋”。如秦桓公二十二年（前 582），秦与白狄“伐晋”；二十五年，白狄攻晋交刚（今山西隰县），为晋军所败。不仅如此，秦国还挑拨晋与白狄的关系，企图从中渔利。前引晋吕相《绝秦书》说，秦与晋盟誓伐白狄，后又暗中告诉狄

① 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第4—7页；段连勤《北狄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30页。

②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912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87年，第414页。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87年，第322页。

⑤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87年，第493页。

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宣公八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页。

人“晋将伐女(汝)”。故白狄恨秦，将实情告诉了晋国。到晋平公十三年(前545)，白狄与晋和好，并附属于晋。^①自此以后，再也不见白狄有活动于陕北和晋西北的记载，而史籍却记载白狄活动于今山西东北及河北一带。留在陕北的白狄，一部分可能为秦所兼并，一部分可能融入稍后兴起于泾河以北的义渠之中。

义渠，为西戎八国之一，其名最早见于商代。《竹书纪年》曾记“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此后很长时间不见有关义渠的记载。到春秋战国时，义渠作为西戎八国之一登上了历史舞台，与秦国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斗争，最终为秦所灭。关于义渠的族属，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西戎中羌之一种^②；一种则以为是狄，即赤狄、白狄之后裔。^③义渠居地在秦之北，即今泾、洛水北，包括秦灭义渠后所置之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南)、上郡(治今陕北榆林南鱼河镇)三郡之地。大约在秦惠公时(前500—前490)，在陕西的义渠、大荔戎最强盛，“筑城数十，皆自称王”^④。

义渠兴起，与秦国长期争战，各有胜负。到秦昭王立(公元前306)，义渠王与秦昭王母宣太后私通，生二子。后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并灭义渠，始置陇西、北地、上郡。^⑤义渠与秦前后争战达150余年，其间也有和平相处的时期。义渠最终为秦所灭，使秦之势力达今陕北地区。此后，义渠人在秦、汉的长期统治之下，逐渐华夏化，余众也多迁于今甘肃者。如西汉时河西有“义渠王骑士”的记载^⑥；汉初，北地、安定郡也有“义渠”^⑦。汉武帝手下还有一批义渠人为将领，如公孙浑邪、公孙贺父子等^⑧；还有西汉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原也为义渠人，以族名为姓。义渠人到西汉后期则先后融入华夏族之中。

到战国末期，兴起于内蒙古阴山一带的匈奴崛起，以后逐渐兼并周围的其他部落，如山西代北及河套的楼烦王、白羊王等，形成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战国以前北方的各种狄、山戎等大都并于匈奴，故史籍自匈奴兴起后，也一概称大漠南北的各部落为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二十八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864页。

②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6—97页；李绍明等《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44页。

③ 李白凤《东夷杂考》附《义渠考》，齐鲁书社，1981年；引王宗维《西戎八国考》等。

④ 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3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4页。

⑥ 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3783页。

⑦ 班固《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282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111《骠骑将军列传附公孙贺、公孙敖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2941、2942页。

匈奴。^①自匈奴登上历史舞台后，就以其游牧民族的强悍和来去如风的勇猛骑兵，不时南下攻掠华夏诸国。战国晚期，冠带七国中有三国（秦、赵、燕）与匈奴为邻。为了抵御匈奴南下的寇扰，三国均筑长城以御匈奴。战国秦长城经今甘、宁、陕、内蒙古等四省区，西起甘肃临洮，东北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西吉、固原、彭阳、镇原、环县、华池，入陕西境内的吴起、志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东北入内蒙古准噶尔旗。另又从陕西靖边南向东分出一支，经安塞、子长、绥德、米脂等县。总计全长2000公里。^②秦长城所经历的四省区中，陕北一段最长，且有分支。

综上所述，自夏、商以至西周、春秋战国时，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族不断与今陕北地区的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鬼方、豳狁、白狄、义渠等族或部落集团相互接触，双方有争战，也有文化的碰撞、交融，最终使各族逐渐融入华夏族中。仅有战国末期崛起于蒙古草原的强大的匈奴与诸华夏族对峙，这一形势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北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诸族及其汉化

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国灭亡战国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后，嬴政改称“始皇帝”，废除分封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徙天下豪富于京师咸阳十二万户。又于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前215—前214），派遣将军蒙恬发兵十三万北击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南，包括今陕北），设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戍守，后又徙民三万家以实之。同时，将原秦、赵、燕三国所筑北边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扩展，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郡（今东北鸭绿江边），延袤万余里。原秦所筑长城则成为防御匈奴的第二道防线。秦始皇命大将蒙恬领兵坐镇上郡，威震匈奴。^③陕西北部成为秦朝防御和震慑匈奴的大本营，迁徙的秦人为华夏族大规模入居陕北地区之始。是时，秦强而匈奴弱，匈奴单于头曼北徙。但是，秦末内地战乱，北边戍卒散亡，于是匈奴南下复据河南地。此时，匈奴冒顿杀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东破东胡，虏人民财物，西击河西走廊的月氏，日益强盛。

西汉建立初，国力衰弱，匈奴骑兵不时侵扰汉朝北边，兵锋达于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及上郡肤施（今延安一带），陕北等地深受其害。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亲击匈奴，被匈奴围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后用陈平计，乃得脱围。刘邦采

^① 中外学者对匈奴的人种及语言系属的讨论甚多，意见分歧。据目前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匈奴自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之后，逐渐统一蒙古草原及西域等地，故其人种语言复杂。大致而言，其东部多为蒙古利亚人，语言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其西部则杂有雅利安人种，语言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②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

用刘敬“和亲”之策，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冒顿单于，每年赐匈奴大批絮、缯、酒、米、食物，约为兄弟以和亲。^①此后，匈奴大举进攻汉朝的战争稍止，但仍不时攻掠汉地，其仅掠汉河套南及今陕北之地，见于记载就有三次：一是汉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犯上郡，杀略人民，汉遣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击于高奴（今延安北），右贤王出塞退走。^②二是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在今陇县），候骑至雍（今陕西凤翔）、甘泉（宫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文帝遣大军迎击，单于留塞月余，乃返。^③三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冬，匈奴绝和亲，各遣三万骑入掠上郡、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北），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月余，汉兵至，匈奴退走。^④

汉武帝即位后（前140），汉朝国力日渐强盛，对匈奴的寇扰及汉的屈从，并不甘心，时时欲伐匈奴。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武帝重用著名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对匈奴的战争。与陕北地区相关的有：

一是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卫青率大军出云中，攻占了河套以南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地，置朔方、五原二郡，徙汉民十万以实其地。经过此役，西汉解除了匈奴对上郡和京师长安的威胁。

二是在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率军两次出陇西，击败匈奴休屠王（在今甘肃武威地区）和浑邪王（在今甘肃张掖东）等部，俘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后浑邪王因休屠王又不愿降汉而杀之，兼并其部众投汉，共计四万余人。武帝在大封匈奴降将以王侯的同时，稍后又将匈奴降众分徙于北边五郡（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九原）塞外，上郡全部、西河（治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部分地区，均在今陕北境内。因其故俗，后又设置属国，复增原秦的典属国官，置都尉、丞、侯、千人等。^⑤上郡属国为其中之一，即是说，有部分匈奴降众已居于今陕北之地。至此，匈奴衰弱，改变了汉初匈奴强汉弱的局面，基本制止了匈奴对汉北边的寇掠，维护了包括陕北在内的汉朝北边的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卫青、霍去病成为汉代抗击

^①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4年。

^② 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卷95《灌婴传》，中华书局，1963年。

^③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4年。

^④ 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

^⑤ 司马迁《史记》卷111《骠骑将军传》，中华书局，1963年；班固《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4年。参见王宗维《汉代的属国》，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